

简论日本越南人社群的形成与社会地位

衣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日本越南人社群是随着印支难民潮产生之后而在日本逐渐形成的新社群。对印支难民的接收开创了战后日本较大规模接收外国难民的先例。为了让越南难民更好地适应在新环境的定居生活,日本方面采取了诸多的措施。如今在日本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越南人社群,但日本越南人在总体上的社会地位还不高。这既与难民本身的特殊性有关,也是由于日本自身对外来人士的封闭性和消极性造成了难民政策措施上的一些缺陷。伴随着对日本社会的不断磨合与适应,日本越南人社群与日本主流社会的距离有望进一步拉近。

关键词:日本越南人;难民;社群;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 D73/77 333.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1)01-0054-07

引言

日本是一个民族组成比较单一的国家。随着全球化与国际交流的深化,来到日本的外国人在逐年增多。据统计,1998年末,日本外国人登录者数达到1 512 116人;2008年末则进一步达到2 217 426人,占日本全国人口的1.74%,来自世界各地的190个国家。^[1]在日本登录的外国人以亚洲地区的人士最多,其中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人数就达到了外国人总数的一半以上。越南人是日本外国人士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不仅形成时间较晚,而且定居的主体人群为难民家庭。2008年末,日本越南人登录总数达到

表1 2008年在日本登录数超过1万人的外国人群体¹

来源地	登录人数
中国	655 377
朝鲜/韩国	589 239
巴西	312 582
菲律宾	210 617
秘鲁	59 723
美国	52 683
泰国	42 609
越南	41 136
印尼	27 250
印度	22 335

收稿日期: 2010-09-11

作者简介: 衣远,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¹ 同上参见日本法务省:《关于平成20年末外国人登录者统计》, http://www.moj.go.jp/nyuukokukanri/kourhou/press_090710-1_090710-1.html 2009年7月。其中中国人登录者总数包括中国大陆人、中国香港人和中国台湾人在内。

41 136人,在日本各大外国居民群体中位列泰国人之后,居第八位。^[2]目前国内对海外越南人的研究还不太多,对日本越南人的关注则更为少见。他们是如何来到日本?在日本的生活状态如何?社群的发展情况怎样?是否拥有较好的社会地位?这些问题都值得去探讨研究。本文主要借助日本国内的一些官方数据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日本越南人社群的形成发展和社会地位进行总体性的梳理和分析。

一、千里飘洋过海越南对日本移民的历史进程

越南与日本交往的历史悠久,早在数百年前两国间就已有人员的往来。15世纪前期正值日本室町幕府时代,一些日本人就已远赴东南亚一带经商,越南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在越南中部的会安一带还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日本人街,至今还留下了日本桥等古迹建筑。到17世纪时,已有一些越南人通过贸易和婚姻关系来到日本。据日本史料记载,1619年,阮氏政权的国王阮福源还将养女“王加久户卖”嫁给了前来开展朱印船贸易的日本人荒木宗太郎,之后两人一同回到日本长崎定居。¹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越南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向海外移居的人口也开始增多。从1905年到1908年,在由潘佩珠和强抵等人领导的“东游运动”中,大批怀着救国图强梦想的越南年轻知识分子前往日本留学。据统计,当时抵达日本的越南学生人数约有200人,被安排在日本的东亚同文馆和振武军事学校等地学习,不少在毕业之后返回了越南从事革命活动。^[3]

然而越南人真正较大规模地进入日本,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南越政权的倒台与中越关系的紧张,大量越南难民因为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恶化而通过陆路与水路逃离越南,连同老挝、柬埔寨出逃的难民一起形成了震惊世界的“印支难民”问题。这些越南难民有一部分流入到周边邻国,被暂时安置在了若干个难民营中。有些则被迫流向汪洋大海,成为漂泊不定、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船民”。为了应对越南战争造成的这一后遗症,美国联手加、法、澳等西方国家开始接纳印支难民。日本迫于外界的压力,也于70年代末开始接受印支难民的登陆。这是日本政府自二战以来首次较大规模地接收外国难民的实践,也标志着日本难民政策的一个重大突破。此前,日本一直采取的是以1951年颁布的《出入国管理法》为基础的出入境管理制度,只管理日本国民及外国人的出入境问题,而并无专门的难民政策。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利,大量印支难民逃亡形成了国际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出于稳定东南亚局势,防止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滋生的目的,要求日本政府也接纳一部分印支难民。1975年5月,在外国船只救助下的18名越南难民在日本登陆,拉开了越南难民进入日本的帷幕^[4],日本政府决定对他们提供暂时性保护。之后,日本政府于1978年正式做出决定接收印支难民,并于次年决定了紧急接收难民的人数。接着,日本于1981年和1982年分别加入了《难民公约》和《难民议定书》并对原有的《出入国管理法》进行修改,于1981年颁布了新的《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从而正式确立了日本的难民认定制度。伴随着这一系列新举措的出台,许多印支难民来到日本定居,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越南。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有序离境计划”(简称ODP)的出台,还有一部分越南难民的家属陆续来到日本与先期抵达的亲人团聚。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5年为止,日本共接纳了印支难民11319人,包括从各国难民营转移到日本的4372人,船民3536人,通过ODP项目来日团聚的2669人,以及在日留学生742人^[5];其中来自越南的难民就多达8656人^[6],占到总数的76.4%。这批难民及其子女后代也形成了今天日本越南人社群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所着重讨论的也主要是这一群体。

进入90年代以后,越南的难民潮逐渐趋于缓和。这一时期新登陆日本的越南人则多以经济目

¹ 参见《荒木宗太郎与安南国王女》,载 <http://www.mekong.net/linkage/anakisoutaro.htm>。王加久公主在长崎一带颇为著名,在当地被称为“一さん”(ani san)。

的为主。随着苏东剧变,不少在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工作的越南留学生与劳务人员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机会。由于日本经济发达,地理距离也相对较近,所以受到了这些越南外出人士的青睞。于是 90 年代以来,日本的越南人数量仍在增加。不过这些人大多都没有取得日本定居权,在日本的滞留时间都有限,流动变化性也比先期抵达的越南难民群体要大。

二、扎根新天地——越南人社群的形成

当 1975 年第一批越南难民抵达日本时,日本方面对其提供的是暂时性保护(在日本被称为“一时滞在”)。而自从 1978 年日本政府正式确立接受印支难民的方针以来,就开始对越南难民提供“定居许可”。这一政策的变化对于越南难民定居日本,形成稳定的社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自从印支难民定居方针出台,日本在国内成立了一系列组织机构来推进难民定居日本的进程。首先,日本政府将该促进事业委托给了亚洲福利教育财团来具体实施,不仅成立了“难民事业本部”,还在其下设置了国际救援中心(位于东京都品川区)、大和定居促进中心(位于神奈川县大和市)和姬路定居促进中心(位于兵库县姬路市)等组织机构。此外,一些教会等非政府团体也积极展开了对越南难民的救助。比如日本天主教会在兵库县的宗座监牧区成立了“越南难民接待中心”;比利时籍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哈里·夸得弗里特神父始终在日本从事越南难民服务工作,被誉为“越南难民之父”。^[8]由于难民自身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定居环境,难民事业本部下的各个援助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的适应指导活动。按照流程规定,被日本接收的越南难民最长可以在援助中心逗留 6 个月。在此期间他们将得到一定的生活费和教育培训补助金,并接受必要的日语语言、生活习惯和职业技能等培训,然后通过中心介绍相应的职业之后开始在日本开展自立的生活。对于离开援助中

表 2 日本政府接纳的越南难民定居数累计变化^[7]

时间	越南人累计 定居许可人数
1978 年 4 月	3
1979 年 12 月	62
1980 年 6 月	277
1981 年 4 月	984
1982 年 2 月	1253
1983 年 11 月	1718
1985 年 7 月	3153
1989 年 9 月	4425
1994 年 12 月	7169

表 3 1999 年末日本关东、关西地区越南人登录数及比例^[9]

地区	人数	占全国 总数的比例
关东地区	7284	48.9%
关西地区	3709	24.9%
全国	14898	100%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入管协会的数据资料整理编制。

心的越南难民,一些非盈利组织如神奈川难民定居援助协会等还负责后续的服务工作。同时,各援助中心还对雇佣越南难民劳动力的雇主提供一定的资金补助。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不少越南难民在当地找到了工作和住处,在日本的生活初步得到了保障。随着印支难民潮的平息,针对印支难民的各专门援助中心也逐渐停止运作。姬路定居促进中心和大和定居促进中心分别于 1996 年和 1998 年相继关闭,东京的国际救援中心也于 2006 年关闭,取而代之的是新设立的 RHQ 支援中心,不再以印支难民作为专门服务对象。同年,日本对印支难民的接收工作正式宣告終了。

通过多方的努力,昔日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越南难民群体终于在日本开始了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如今,在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都有越南难民的分布。不过由于针对印支难民的主要援助中心设在关东的东京都、神奈川县以及关西的兵库县,所以相应地,越南难民家庭也主要聚集在关东和

关西两个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原来被安置在偏远地带的越南难民家庭为了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又开始了自发的迁移,这与美国、加拿大等地越南难民的情况有些相似。在第二次迁徙中,日本越南难民表现出很强的“都市近郊化”特色。一方面大都市的近郊城镇交通方便、距离都市中心不远,工作机会和生活设施都比较优厚;另一方面近郊城镇的住房租金低廉,适合中低收入者起居。所以在越南难民聚居的关东、关西地区,又是以东京横滨周边与大阪神户周边城镇的越南难民居民最为密集。

人数上的增长,工作岗位的落实,居住地的安置,都为越南人在日本形成一个稳定的外国人社群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从最初一批越南难民抵达日本至今已经过去了 30 多年的岁月,一些难民与日本当地人通婚,不少家庭还诞生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这些越南人长期居住或者出生在日本,缺乏返回越南的足够条件或意愿,逐渐从暂时寄居的外来客变成了日本的长期定居者,取得日本永久居住资格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这些定居日本的越南人不仅有着共同的母国和语言文化,还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从而形成了较强的社群认同感,在工作和日常起居中相互提供帮助,还成立了多个面向越南人社群的社团组织。以越南人居民众多的东京和神户为例,就有政治团体“在日越南人协会”、宗教团体“神户天主教共同体”等多个越南人组织的出现。一个初具规模、体系上日趋完善的越南人社群在日本逐渐成长起来。

表 4 日本关东、关西主要都市区域越南国籍者的人口动态¹⁰¹

年份	东京	神奈川	埼玉	大阪	兵庫	全国	五地占全国的比重
1980	323	234	137	202	104	2742	36.5%
1985	905	619	268	248	697	4126	66.3%
1990	1366	1275	473	371	1147	6233	74.3%
1995	1154	1956	923	626	1752	9099	70.5%

三、主流之外的少数——日本越南人的社会地位状况及原因分析

当年日本为了接纳越南难民采取了众多措施,经过一定时间的适应和磨合,越南人在日本也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社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越南难民问题已经万事大吉。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新的难题又逐渐浮出水面。日本方面对难民所采取的援助措施大多是为应对落户初期的问题而设计的。而如今难民家庭的情况较之 30 年前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 ODP 来到日本团聚的亲属、通婚出现的当地配偶以及新诞生儿孙后代,使得越南人社群的人数不仅在增加,而且组成也变得复杂起来。再加上定居化趋势的出现,日本越南人社群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复杂社会问题,包括语言、就业、子女的教育,母国文化的传承、家庭成员的社会参与、家庭内部的代沟与分歧等等。难题的焦点已从当初的如何在日本社会迅速立足,逐渐变为如何融入日本的主流社会。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越南人群体对日本的适应还依然困难重重,社会地位的状况也仍然比较差。

首先是政治地位低下。表现为入籍率低,政治权利不足。如前文所述,截至 2005 年底日本一共接收了 8 656 名越南难民,其中不少人在日本已经连续居住了 20 年甚至 30 年之久,但是获得日本国籍的人直到 2009 年底却也只有 730 名¹¹¹,仅占总人数的 8.4%。绝大多数越南难民都是以“定居”(即定居)以及“永住”(即永久居住)的身份生活在日本社会中,实际上仍然是“外人”。由于没有获得日本国籍,大多数日本越南人都无法像日本国民一样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无法参与到主流政治中去为自己社群的合法权益发挥作用,而只是有关部门政策措施的被动接受者。虽然在

日本也有人提出过给予永住外国人参政权利的构想,但是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¹ 据媒体调查,日本现有 90% 以上的人反对给予外国人地方参政权^[12],反对者的示威活动也常有发生。越南人社群政治地位低下的面貌短时期内恐怕无法得到大的改观。

其次是经济地位低下。表现为就业层次低,从事制造业体力劳动的比例大,非正式员工的比例高,工作岗位不稳定等特征。虽然越南难民在来到日本之后都会接受援助中心的就业培训,并通过中心介绍在日本求职,但是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大部分人都无法从事中高端的职业。在援助中心学习日语的时间只有短短 4 个月时间,若要在此后迅速地投入职场,基本只能前往不需要多少语言技能的制造业行业。不少难民员工因为收入待遇和居住条件的问题,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通过同胞等的介绍更换了新的工作。但是由于之前工作环境对语言能力的提高不大,最终还是只能从事类似的体力工作,或者自谋出路,进行旧货贸易、废品回收等买卖谋生。这些难民之中不乏一些在越南期间的工程师、教员等较高层次的专业技能者,但是同样受限于语言问题,加之无法提供能在日本得到有效承认的职业资格证明,而也不得不投入比较低端的行业中去。还有人在越南期间曾是在校学生或者军人,缺乏工作实践经验,来到日本之后要求得一份理想的职业更是困难重重。一位越南难民女士在一次采访中抱怨道:她原来在西贡曾是小学教员,并在贸易公司从事过事务性工作。来到日本之后却只能担任一些临时性的特聘翻译和语言教学工作,对日后的生活感到十分不安。尤其是同逃往美国的兄弟姐妹相比,感觉在日本要谋求一份好工作实在机会太少。^[13]由于工作层次低下、经济条件严峻、以及职位不稳定性等原因,越南人社群内存在着较大的不安全感。在一次针对神户市周边越南人社群的调查中显示,处于失业中的人群比例高达 16.3%^[14],远远高于日本同期的社会失业率。

然后是文化教育地位低下。表现为整体受教育水平差,辍学率高,受教育条件不足。2001-2002年间在神户市和姬路市及其周边市镇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成年越南人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最终学历在高中及其以下的比例高达 76%。^[15]另据神奈川教育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日本印支难民的高中就学率还不到 40%,而日本国民的高中就学率则高达 96.8%。^[16]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所导致。日本和越南在语言文化和教育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少青少年尤其是大龄青少年跟随父母来到日本之后虽然有较强的接受教育的愿望,却发现很难适应日本的学校环境,跟不上教学的进度;一些年龄较小或在日本出生的难民子弟虽然也能较快掌握日常日语的听说能力,但是在读写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困难,与同学的交往相处也仍存在若干障碍。许多越南籍的学生为了避免同学的嘲笑等不快经历,在学校都使用日本名字。^[17]另一方面,日本的中小学缺乏教育外国青少年的足够经验和条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都不能很好地针对外国人子弟进行调整,虽然一些学校开设了国际班,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满足越南人子弟的需求。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教学内容,这些越南籍学生往往无法很好地应对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许多人在应考高中时就困难重重,更难以走进大学的校园。当然,还有一些家庭出于经济情况考虑,较早地就让子女外出打工赚钱,从而失去了进一步接受教育的机会。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低下,越南人社群在日本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经济收入持续偏低,形成了恶性循环。

由此可见,日本越南人总体上还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弱势性群体。这其实是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结果。一方面,从越南人群体的自身条件来看,由于他们大多具有难民或难民家庭的背景,来到日本时既无充足的财产,也无针对在日生活的准备和技能,只是被迫接受了一个快速立足社会的安排,因此对于新的环境往往感到不知所措。他们在日本社会的发展起点比日本本国甚至比许

¹ 给予外国国籍者参政权在世界上已有先例。例如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瑞典、丹麦、荷兰等国就陆续给予外国国籍者地方参政的权利。

多外来劳工都要低很多。同时,越南人虽然是日本第八大外国人群体,但是绝对人口数量仍然很少,在日本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过数千分之一,而其中属于定居或入籍的人数更为稀少,是名副其实的“少数中的少数”。因此他们也很难唤起足够的社会关注和关怀。虽然随着时光的推移,一些日本越南人尤其是新一代人士也开始逐步摆脱了“打工的”、“做饭的”、“收废品的”等传统形象,而从事教师、银行家等比较高端的职业;一些年轻人如 Phongchi 阮陈福安等还成为了众目关注的公众明星,但都毕竟是少数。¹ 越南人社群在日本的整体社会地位仍然有待提升。

另一方面,从日本政府和社会的方面来看,日本也未能向越南人社群提供足够的进入社会主流的机会和条件。首先是日本岛国封闭性文化在起作用。日本四面环海,没有任何一个陆地邻国,长期在历史和文化上存在着较强的独立性。这使得日本社会对于大量外国人士的到来存在一定的抵触和排斥心理。例如政治人物麻生太郎在 2005 年担任总务大臣期间,就曾抛出“日本是单一民族、单一语言和单一文化”的言论。^[18] 二战以来,日本在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难题,日本政府却没有大量引进外国劳力,而是更多地希望通过采用推广机械自动化和延长国民工作年龄来加以应对。对于同日本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难民群体,日本政府更是采取了不欢迎的态度。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日本对联合国难民署采取了积极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却对难民的认定采取了很谨慎的做法。同时,由于难民和一般外国移民还不同,被各种生存问题缠身,所以大量难民的出现对接收国来说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社会负担。而日本国内本身各方面的资源也十分有限,所以也使得日本上下对这些难民尤为反感。民间出于工作就业、健康养老保险等各方面实际需求的考虑,对接收难民也往往持消极态度。据一项调查显示,日本有大约半数的国民不愿意日本接收移民和难民。^[19] 日本的政治家们出于选举的考虑,也大多不会多去碰触难民政策这一烫手的山芋。由此,日本对于难民的姿态长期以来都很消极被动。面对成百万的庞大越南难民潮,日本不仅严格控制了准入的数额,仅接纳了其中极小的一部分^o,而且对于接收准入的这一批越南难民,也只是以让他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为目标,而没有意愿提供足够的支持和便利让他们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体分子。诸如美国对越南难民采取的高入籍率措施、澳大利亚对越南难民提供的外来职业资格认证的便利等,在目前的日本都难以实现。相应地,日本越南人群体的处境也远比在这些国家的越南人要困难。

四、小结

越南人社群在日本的形成,是由于某一突发历史事件而造成的结果,并不在日本政府和社会原本的预想之内。这无论对日本的国际责任还是国内的包容度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一方面推动了日本对长期以来保守的移民和难民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在日本外交和国际合作中也有着一定的里程碑意义。另一方面也迫使日本国内在社区建设、职业介绍、学校教育等方面积累更多的国际化经验。日本为越南难民在日本的定居作出了不少前所未有的尝试和努力,但在制度安排之中仍然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与不足。越南人在日本作为一个非主流的少数群体,还远远没掌握进入日本主流社会的条件与资源,社会地位在总体上还比较低下。

由于定居的长期化,越南人在日本形成一个稳定发展的社群将是历史的必然。近年来在日本

¹ Phongchi 是日本的一名媒体偶像,生于日本神奈川县,父母是来自南越西贡的难民;阮陈福安是一名知名的棒球选手,生于长崎县,父母是来自南越同奈省的难民。

^o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资料统计,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接收难民数量最少的国家,在西方 7 国中间远远少于其他 6 国。

出生的越南人后代逐渐成长起来,他们对于日本的语言和文化接受速度较快。但同时对越南的语言和文化却不太熟悉,与长辈甚至无法流畅地交流,对越南国内的事情也几乎一无所知。相反,许多老一辈的难民至今也没有很好地适应日本的环境,对于越南文化也有较强的认同感和自豪。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越南家庭内部的分歧与代沟。这种变化虽然使得日本越南人的家庭内部出现了一些摩擦和不稳定性,但同时也体现出新一代日本越南人群体向日本主流社会靠拢的端倪。根据日本官方的调查,日本越南人在总体上对于长期扎根在日本有着较强的意愿。¹ 随着越南人社群的不断成长与努力适应,他们的社会地位有望得到提高,同日本社会的融合度也将进一步加强,但这无疑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

注释:

- [1][2] 日本法务省:《关于平成 20年末外国人登录者统计》, http://www.moj.go.jp/nyuukokukanri/kouhou/press_090710-1_090710-1.htm 2009年 7月。
- [3][越] 阮文鸿:《近代中国和越南东游的历史现象》,覃丽芳译,《国际学术交流》2007年 4月第 2期,第 128页。
- [4][7] 户田佳子:《日本的越南人社群》,晓印书馆,2001年,第 2、1页。
- [5] 日本外务省:《难民问题与日本 III—国内的难民接收》,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nanmin/main3.htm> 2009年 12月。
- [6] 日本难民事业本部:《日本定居难民雇佣促进手册》, <http://www.rhq.gr.jp/japanese/profile/pro/pdf/09koyou.pdf> 2009年 10月。
- [8] 《“越南难民之父”介绍二十五年艰难的一体化进程》, <http://www.cncatholic.org/xpd/0733208240.htm> 2006年 11月 26日。
- [9] 财团法人入管协会:《平成 12年版 在留外国人统计》,2000年 7月,第 50—51页。
- [10] 日本法务大臣官司法制调查部编:《出入国管理统计年报》资料,转引自川上郁雄:《越境的家族:在日越南裔居民的生活世界》,明石书店,2001年,第 117页。
- [11] 日本难民事业本部:《日本的难民接收》,载 <http://www.rhq.gr.jp/japanese/kuu/ukeire.htm>。
- [12] 《直击日本参院竞选纲领 外国人参政权受关注》,载 <http://japan1.people.com.cn/35469/7034642.htm> 2010年 6月 22日。
- [13][14] 西野史子、仓田良树:《日本越南人定居者的社会融合》,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世代间问题研究机构第 74号讨论文件,2002年 3月,第 16、12页。
- [15] 仓田良树、津崎克彦、西野史子:《关于越南定居者就业与生活的实态调查》,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世代间问题研究机构第 76号讨论文件,2002年 3月,第 10页。
- [16] 细谷早里:“A Case Study of Indochinese Refugees in Japan - Their Experience at School and Occupation”,载《关东学院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年报》2006年 4月,第 210—211页。
- [17] Masami Shingaki, Shinichi Asano, "The Lifestyle and Ethnic Identity of Vietnamese Youth Residing in Japan", in Roger Goodman, Ceri Peach, Ayumi Takenaka and Paul Whie (eds), *Global Japan: The Experience of Japan's New Immigrant and Overseas Commun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 170.
- [18]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麻生太郎简介》, <http://news.sina.com.cn/w/2008-09-01/225716212345.shtml> 2008年。
- [19] 和岛理爱:《日本难民政策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 2期,第 53页。

[责任编辑:邵 鸣]

(下转第 72页)

¹ 根据日本内阁官房印度支那难民对策联络调整会议事务局 1997年对日本越南人定居意向的调查,希望获得日本永久居住权的人有 32.6%,希望加入日本国籍的人有 32.4%,两者合计高达 65%。与之相对地,在条件齐备的情况下愿意回到越南的人只占到 15.2%,希望前往第三国生活的人只有 4.9%。参见宫岛乔编:《外国人市民与政治参与》,有信堂高文社 2000年版,第 159页。

- [7]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 12- 128页。
- [8] 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1999年,第 27页。
- [9] 柯嘉逊:《513解密文件》,杨培根译,第 11- 25, 95- 121页。
- [10] [12] 荒井茂夫:《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和认同结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 2期,第 23- 35页。
- [13] Gumperz J. J. *Discourse Strate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责任编辑:乔云]

Study of Social Manifestation on Code-switching of Chinese Teen-age students in Pulau Pinang of Malaysia

XU Lirshan (Malaysia), ZHAO Ling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Zhejiang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Zhejia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language attitude of Chinese teenage students in Pulau Pinang of Malaysia tends to bear more sense of identity on Chinese from individual emotion, and they agree that the native dialect is more genial and needed to master, but heritage awareness on dialect is not strong. The language attitude tends to bear more sense of identity on social practical value of English than Malay. On analysis of Social Manifestation on student's code-switching, language attitude affects selection of host language and embedded language. Language habits and Linguistic capacity of other sides of chatting that affected by generation affect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code-switching. Level of formality and function of chat sites and ethnicity of other sides affect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code-switching jointly. Status of language or dialect and level of formality of conversation topic both affect it.

Key words Pulau Pinang of Malaysia, Chinese teenage students, code-switching, matrix language/host language, embedded language/guest language

(上接第 60页)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Formation and Social Status of the Vietnamese Community in Japan

YI Yu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Vietnamese community is a new community in Japan which is gradually formed as a result of the Indochinese refugee wave. The acceptance of Indochinese refugees sets the first example of large-scale acceptance of foreign refugees by Japan in the postwar era. Japan has carried out various measures in order to make the Vietnamese refugees better adjust to their lives in the new environment. Nowadays, there has been quite a stable Vietnamese community in Japan. However, their social statuses are generally not high. This is not only due to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refugees themselves, but also is because of the enclosed and negative attitude of Japan toward foreigners which has caused several defects of the refugee policies.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adaptation to the Japanese society,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Vietnamese community and the mainstream society of Japan will get closer in future.

Key words Vietnamese in Japan, refugees, community, social status